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年1月 第44卷第1期 Jan. 2014, Vol. 44, No. 1

Journa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文学研究】

从个体、阶级到阶层:中国现当代家族小说叙事主体的置换

李谟博

(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陕西 西安 710061)

摘要: 维系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家国同构的社会形态有其内在的合理性,现代家族小说的倡导者们试图以“个体本位”取代“家族本位”的努力,受到抗战家国命运一体现实的质疑。当代家族小说以阶级本位颠覆了现代家族小说,又被市场经济秩序带来的阶层本位所取代,而个体在阶层社会中依旧上演着“骆驼祥子”的悲剧。

关键词: 家族;个人;阶级;阶层;家族小说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731(2014)01-0135-04

家族小说是以家族社会兴衰为对象,以父子、夫妇等人伦关系及人情世态为核心来反映社会生活的小说。《金瓶梅》是明代出现的最成功的家庭小说,拓展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空间,鲁迅说作者“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1] (P108)}。但《金瓶梅》注重描写的只是一个家庭的兴衰荣辱,并没有特别关注家族历史的发展。此后陆续出现了历史跨度更大的家族小说,如《醒世姻缘传》《林兰香》等,而《红楼梦》则达到了古代家族小说叙事的顶峰。

一、现代家族小说:从家族本位到个体本位

五四前后,新文化的倡导者们开始以现代眼光审视维系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家族制度,陈独秀指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东方民族“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2]。然而以“个人”易“家族”的文化启蒙,对国人来说,却是何其艰难。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创了现代家族小说叙事的先河,对中国封建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郁达夫的《沉沦》以个体在社会和家国中的孤独、绝望、无助来表现个体与家族、国家的疏离感。随后,那些接受了现代思想、具有启蒙意识的现代作家开始以西方近现代价值观为参照,对包括家族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彻底的、形象化的颠覆与批判,反对封建族权、父权和夫权成为“反封建、反礼教”的代名词,也成为现代家族小说叙事的主题,即通过描写中国典型家族模式的解体与衰败,预示以家族为基本细胞的中国宗法制社会已走向没落,终将被现代民族民主国家所取代。现

收稿日期:2013-05-16

作者简介:李谟博,男,陕西商南人,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代家族小说的代表性作品有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及《憩园》、张爱玲的《金锁记》、林语堂的《京华烟云》、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及老舍的《四世同堂》等。它们通常以一姓的贵族官僚世家或几世同堂的城镇庶民家族为叙述对象,以代际间的矛盾及现代家庭观念和婚恋观与封建家族伦理冲突为叙事框架,反映社会历史的变迁;或以几个家族几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或情感纠葛为叙事对象,反映家族制度的衰败。这些作家自觉地接受了西方个性解放、人本主义思想和现代婚恋观,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封建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揭露了封建家族吃人的本质,及家族内部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和家族成员温情下的自私、贪婪和虚伪,揭示了封建家族制度专制落后残忍的本质。

巴金的《家》第一次立体真实地再现了封建大家庭的生活形态,塑造了高家三代各具特色的人物群像,展现了家族内部严格的等级秩序和规范对家族成员自由发展权利的剥夺,暴露了家族制度戕害生命、压抑人性的罪恶。梁漱溟说“中国的家族制度在其全部文化中所处地位之重要,极其根深蒂固,亦是世界闻名的。……中国所以至今被人目之为宗法社会者,亦即在此。”^{[3][P20]} 张爱玲对封建家族遗老遗少们的空虚、堕落、无能给予了深刻的揭露与嘲讽,如《金锁记》剖析了在封建礼教和拜金主义双重枷锁下人性扭曲的女暴君曹七巧病态的生活、心态及畸形的婚恋,通篇弥漫着末世的凄凉与衰败。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描写了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苏州巨富蒋捷三家迅速衰败解体的过程、蒋家儿女无法排解的精神苦闷与彷徨以及永远无法摆脱的家族阴影。

“家国同构”的社会形态维系中国文明几千年,必然有其内在的某些合理性。日本学者稻叶君山在《中国社会文化之特质》中写道“保护中国民族的唯一障壁,是其家族制度。这制度支持力之坚固,恐怕万里长城也比不上。”^{[4][P41]} 抗战期间,家国命运一体的现实使作家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的家族制度。老舍的《四世同堂》把祁家四代和他们生存的小羊圈胡同放置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将家族与民族命运结合起来,反思家族文化在民族文化和国民性塑造上的影响,寄希望于战火激发民族性、焚毁国民劣根性、重振民族精神,表现出作者对家族文化的脉脉温情与丝丝眷恋。巴金的《憩园》中,大家庭也由“激流三部曲”中吃人的恶魔变成了安抚漂泊者受伤心灵的避风港,有“归家寻梦的哀伤情调”,表现出作者对传统家族文化的几多怀恋与认同。

新中国成立,国民党逃往台湾,家族文化和家族历史因政治因素而被人为地割裂了。台湾文学中的家族叙事从此成为“无根游子的绝唱”;在大陆,阶级关系迅速取代血缘维系的家族关系,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在文学中的家族叙事随之转变为革命历史叙事。

二、当代家族小说:从阶级本位到阶层本位

新中国建立后,土改、城市工商业改造和四清运动等社会政治运动,都将宗族作为封建标志进行清除,宗族的公地、房产被没收并重新分配,祠堂被砸毁,族谱被烧毁,宗族观念被严厉批判,族长权威被剥夺,至文革前,家族组织形式已基本瓦解,遗留和残存的家族意识和家族观念在阶级意识压制下,成为隐性的存在,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变得简单而纯粹,即人民和阶级敌人两大阵营,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中国民族延续几千年的“家族本位”被“阶级本位”所取代。农村里的中农和城市中的知识分子成为夹缝中生存的尴尬群体。文学创作中关于“中间人物”的讨论就与此相关。农村题材叙事中的中农成为落后保守的象征,如《三里湾》中的马多寿家、《山乡巨变》中的菊咬筋家、《创业史》中的郭世富家等。这些艺术形象的出现从侧面说明了传统乡村家庭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艰巨复杂。

“十七年”期间的家族叙事是被意识形态化了的家族叙事,阶级诉求打破了五四以来现代家族叙事的文化启蒙诉求。以《红旗谱》和《三家巷》为代表的家族小说率先突破了现代家族小说的叙事模式,以

阶级话语模式取代反封建、反礼教的启蒙主题,以新旧文化矛盾冲突的情节模式取代现代家族小说中“父子冲突”。文本的叙事核心由揭示家庭内部矛盾转向揭露剥削阶级家庭政治上的反动性及其对人民压榨的残酷性。《红旗谱》中家族关系构想的基础是“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解放全世界受苦的人”的阶级理念。朱家和严家是没有血缘关系的“非亲同族”,阶级情谊却超越了血缘纽带。《三家巷》中周炳作为“逆子”反叛的不是周家,而是造成有姻亲关系的几家人经济上不平等的社会。为强化阶级对立,竟出现了陈万利想纳外甥女区桃为妾(《三家巷》)、冯老兰想霸占春兰(《红旗谱》)之类情节。作家们有意识地忽略了人类社会最原始的乱伦禁忌,革命的政治伦理秩序轻易地置换了传统家族伦理秩序。

文革中,阶级关系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由此引发的父子反目、夫妻反目、朋友反目等悲剧数不胜数,伤痕文学中有大量相关描述。比如《伤痕》中的王晓华自觉、决绝地与被打成叛徒的母亲决裂,离家出走,并对母亲心存怨恨。政治原因造成的偶像坍塌使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代人感到巨大的悲哀和失落,他们成为丢掉钥匙的孩子,没有归属感。韩少功的《归去来》即形象地表达了这一心理状态。张承志在《北方的河》中踏上了“寻父”的征程,对“黄河”这一父亲的认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认同的隐喻和象征。当稳定的农耕文化被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的工业文化侵蚀、消磨,无家的恐慌使人们下意识地怀恋起传统的家与家族来,在文学想象中重温传统家族文化的血缘亲情和伦理氛围,给人以生存价值的确认,使人找回了久违的历史感与厚重感。

其后先锋作家率先开始了对家族命运的反思,同时注重挖掘表现个体欲望在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家族颓败是历史的必然,对原因的追溯却因人而异。余华《现实一种》中家族的毁灭就是非理性情绪作用的结果;苏童《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陈氏家族在贪欲、肉欲和仇恨的交织中交替着盛衰的历史,生命无意义的毁灭暗喻着斗争史的无意义;莫言的《红高粱家族》所呈现的以暴力和原始激情创造的新鲜血脉竟是一个孱弱病态的躯壳。“种”的退化和“断子绝孙”的现实恐惧,迫使人们不得不反思家族伦理秩序的意义。从先锋作家的家族叙事中,读者看到人才是世界真正的主宰,人性的退化和失落是中国传统社会转化和家族文化衰落的根本原因;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只是外在的背景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人和家族文化本身。先锋作家的探索过分强调非理性在家族叙事中的作用,并没有续接上现代家族小说个体价值诉求的脉动。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金钱法则成为维系中国社会的重要因素,家族叙事中的个体诉求随之走向了式微。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市民阶层崛起;90年代,社会阶层进一步分化,“中产阶级”阶层出现;世纪之交,庞大的“社会底层”形成,包括农民工、下岗工人、城市低收入者和农村留守人员等,此群体生存处境的艰难和个体挣扎的无望,逐渐形成一股暗潮。曹征路的《那儿》、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所展现的无一不是这样的社会景像:底层的阵容不断壮大,社会阶层取代阶级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底层的人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命运和现实生存状态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涂自强成为祥子的翻版。没有父辈的积累(权力、财富、社会关系)和扶持,下一代只能重蹈父辈的覆辙;家族制度和家族文化被市场法则消解,但家族灾难却在延续,改变不了的只是家族所处的社会阶层。《秦腔》是贾平凹为故乡和正在失落的乡土文明树起的一块碑子,随着夏天义的惨死,引生的自残,白雪的被弃,维系夏家的家族文化传统土崩瓦解。乡土文明与家族文化在中国是相互依存的,乡土文明的失落使家族失去了赖以依存的丰厚土壤。

中国社会从改革开放前的阶级本位转变为当下的阶层本位,阶层的划分严格遵循市场经济的运行法则,人与人之间的精神纽带变成了权力、金钱和利益。文学领域随之出现了中产阶级立场写作、官场小说、职场小说、打工文学、新乡土写作、底层写作、新红颜写作等,这些写作形式代不同的社会阶层立

言,拥有各自的读者群。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家族失去了空间上的独立存在,维系家族宗法制度的祠堂、祭祖、族谱等仪式和形式上的东西失去了生存的空间,独生子女政策使“家族”被“家”所取代,姻亲关系取代宗亲关系成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家族和宅院成为城市“蜗居者”和“蚁族”灵魂的暂时栖息地。这是新世纪宅院文化流行的深层文化心理,家族文化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但靠利益维系的阶层内部联盟又是何其脆弱,对于这一点,官场小说、职场小说和打工文学都作了多角度的描述,官场争斗、职场竞争以及打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的激烈并不亚于改革开放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高兴》中拾荒者之间的倾轧给主人公带来的痛苦和灾难有时甚至超过了城里人带给他们的歧视。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发现“说得着”比血缘关系更重要,“说得着”的人很多时候是同一社会阶层的人。人的无根感、孤独感等精神痛苦很多时候是由言语造成的,所以主人公对家族历史的追寻最后归结到对“一句话”“一个说得着的人”的追寻,就显出了其必然性。通过叙写这样的追寻,作者轻易地从根上颠覆了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家族制度。

总而言之,新世纪以来,文学中渗透于乡土叙事、历史叙事和底层叙事中的家族叙事呈现出全新的形态,以阶层的价值诉求取代阶级的价值诉求,但本质上并没有超越五四时期的以个体本位取代家族本位。个体作为独立自由的生命体取得在社会的合法性地位还需要漫长的时间。从《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看来,整个社会阶层即底层生存现状的改变,依然是“涂自强”们命运改变的契机或前提。

参考文献:

- [1]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全集:第9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 [2] 陈独秀. 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J]. 新青年,1(4).
- [3]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4] 梁漱溟全集:第3卷[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赵 琴]

Form Individual , Class to Section: The Displacement of Value Pursuit about Contemporary Family Novels

LI Jian-bo

(Shaanxi Provincial Feder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 Xi'an 710061 , China)

Abstract: The Home countries isomorphism had its internal rationality , which has existed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efforts were questioned by reality of the fate of one. Modern family novels advocates had tried to individual standard instead of family. The contemporary family novels made section standard subversion of Contemporary family novels , and is also replaced by class standard in the market economy. Tragedy of *Camel Xiangzi* is still staged in the reality.

Key words: family; individual; class; section; family novels